

95
K256.306

1
2

日本侵华间谍与谋略

刘永祥 常家树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沈阳

219907



C

(辽)新登字第9号

BA 52/11

日本侵华间谍与谋略

刘永祥 常家树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崇山中路66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分厂印刷

251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125 字数: 200千
1994年5月第1版 199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责任编辑: 常江

封面设计: 陈景泓
责任校对: 张琨

ISBN 7-5610-2547-5
K·271 定价: 6.50元

100015



前 言

从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到1945年战败投降，在半个世纪里，日本帝国主义从战争走向战争，从未曾停止对中国的侵略，枪炮之声不绝于耳，给中国人民同时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是一段永远不能忘却的历史。

自明治维新确立了对外扩张的所谓大陆政策之后，为了配合军事侵略，日本政府和军部不断派遣间谍特务人员，潜入中国。他们以外交人员、商人、学者、教师、医生、旅行者、侨民、僧人、妓女等身份为掩护，深入宫廷官府、穷乡僻壤，结交达官显贵，收买汉奸走狗，把触角伸向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想方设法搜集各种情报，为日本军政当局制订侵华方针、政策及战略战术提供真实可靠依据的同时，还千方百计在中国各军阀和派系中煽风点火，挑拨离间，以坐收渔人之利。虽然他们的活动少有刀光剑影，但是却阴险诡秘，隐含杀机，同样充满着血腥。而且，具有更大的欺骗性，能够起到枪炮所起不到的作用。它给中国带来的危害，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历史事实所证明。

本书从日本侵华时期间谍与谋略的活动中选取了一些较为典型的事件和人物，大体按时间顺序，予以展示和分析。目的是试图以此引起人们对这一历史事实的重视，从而记取历史教训，让中华民族那段任人摆布、宰割的历史永远成为历史。

著 者

1994年3月

1/

目 录

第一章 踏上侵略之路

- 一、“失之欧美，取之亚洲” (1)
- 二、谍报指挥机关的建立 (8)

第二章 先胜一筹：甲午战争前的间谍与谋略

- 一、神秘的“旅行” (13)
- 二、汉口乐善堂 (19)
- 三、日清贸易研究所 (24)

第三章 致胜一环：甲午战争中的间谍与谋略

- 一、密布谍报网 (30)
- 二、宗方小太郎的“奇功” (38)
- 三、辽东“三崎” (45)
- 四、中国人的耻辱 (52)

第四章 明争暗斗：日俄战争中的间谍与谋略（上）

- 一、海参崴和尚与哈巴罗夫斯克杂货商 (56)
- 二、哈尔滨“菊地照像馆” (63)
- 三、喀喇沁王府里的女教师 (68)
- 四、内田良平与黑龙会 (72)

第五章 明争暗斗：日俄战争中的间谍与谋略（下）

- 一、明石元二郎后院点火 (76)
- 二、青木宣纯组建“特别任务班” (85)
- 三、利用“马贼” (91)
- 四、战地谍报 (102)

第六章 阴谋与梦想：川岛浪速和“满蒙独立运动”

- 一、冒险起家 (112)
- 二、“忘爵之交” (116)
- 三、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 (120)
- 四、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 (127)
- 五、畸形产物 (141)

第七章 无孔不入：满铁的情报活动

- 一、“文治的武备” (150)
- 二、庞杂的调查机构 (153)
- 三、多样的情报手段 (163)

四、关东军的帮凶.....	(170)
---------------	-------

第八章 生杀予夺：对张作霖的利用与暗害

一、张作霖崛起.....	(183)
二、暗杀与支持.....	(186)
三、安插“顾问”.....	(188)
四、矛盾激化.....	(192)
五、皇姑屯炸车.....	(196)

第九章 走向“九·一八”：关东军阴谋得逞

一、东方会议.....	(206)
二、早有预谋.....	(209)
三、中村事件.....	(216)
四、提前动手.....	(221)

第十章 微笑的魔鬼：土肥原贤二的谋略

一、阴险的笑意.....	(228)
二、诱胁溥仪.....	(234)
三、策动“华北自治”.....	(239)
四、挥起屠刀与重操旧业.....	(248)

第一章 踏上侵略之路

1868年，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日本政府进行了著名的“明治维新”，使日本迅速走上强盛之路，摆脱了沦为欧美列强殖民地的厄运。但是，同时也使日本走上了侵略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的道路。日本对中国的间谍与谋略活动，就是在其对外侵略扩张的思想支配下进行的。

一、“失之欧美，取之亚洲”

日本大规模的对外侵略扩张虽然是在明治维新之后才付诸行动，但是其侵略思想却酝酿已久。在幕府末期出现的所谓“海外雄飞论”和“攘夷论”，便包含着强烈的侵略扩张思想。当时思想界各种学派都极力鼓吹侵略朝鲜、中国东北乃至整个亚洲大陆，其中比较有名的人物为本多利明、佐藤信渊、桥本左内、佐久间象山等。本多利明在其所著《西域物语》一书中论述了“将日本造成天下第一的最良国家的必成道路”，即入侵堪察加、库页岛、满洲（中国东北，下同），发出了所谓日本国民的帝国主义“雄心复兴的第一声”^①。佐藤信渊在《宇内混同秘策》一书中则野心勃勃地宣称：“皇大御国乃天地间最初成立之国，为世界各国之根本”，因此，“皇国号令世界

^① 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

各国之天理”是不言而喻的；根据这一“天理”，皇国要首先并吞满洲，继而将中国全部领土划入日本版图，而后从东南亚进军印度，“合并世界各国”。^① 明治维新前在鼓吹对外侵略扩张思想方面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当属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人的老师吉田松荫。他在1855年日本同美、俄两国缔结条约后寄给其兄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与俄、美媾和，既成定局，不可由我方决然背约，以失信于夷狄。但必须严订章程，敦厚信义。在此期间蓄养国力，割据易取之朝鲜、满洲和中国，在贸易上失于俄、美者，应以土地由朝鲜和满洲补偿之。^②

他在所著《幽囚录》中还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设想：

现在要加紧进行军备，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可开拓虾夷（北海道），封立诸侯，乘隙夺取堪察加、鄂霍次克海，晓谕琉球……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一如古时强盛之时。北则割据中国东北的领土，南则掠取中国台湾及菲律宾群岛……^③

吉田松荫这种一方面屈从欧美列强，另一方面则侵略和征服亚洲大陆，以“补偿”损失、扩张领土的“欺弱避强”的思想，为后来的明治政府所继承，发展成为一条以侵略中国大陆为主要目标的国策，即所谓的大陆政策。正如日本历史学家所分析的那样：“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时，天皇制——反动的半封建的官僚和大土地私有者取得胜利，为了排除帝国主义列强对日本的歧视（不平等条约）进行初期斗争，使日本采取了掠夺邻近弱小民族的斗争形式，这就开辟了走向现代帝国主义强盗政策的道路。”^④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获得成功。刚刚从欧美列强的压迫下挣

① 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中译本，第2页。

② 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中译本，第2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第130页。

脱出来，喘息未定，明治政府就把对外侵略扩张提到首要的议事日程。在当年以明治天皇名义颁布的《安抚万民之宸翰》中宣称：“继承列祖列宗伟业，不问一身艰难辛苦，经营四方，安抚亿兆，冀终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为了征服亚洲大陆，日本政府把征服朝鲜作为实现其目标的第一步，因此便出现了所谓“征韩论”。最先提出“征韩”的是参议木户孝允，他在1868年12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目前“至关紧要之事有二，一望迅速确定天下方向，二望向朝鲜派遣使节，责其无礼，若其不服，则兴问罪之师，以伸张神州之威。”^①12月19日，日本政府通过对马藩主向朝鲜递交国书，釜山的朝鲜官员发现这个国书的格式不符合日朝交往文书的惯例，而且文书中出现了只有大清国皇帝才能对朝鲜使用的“皇”、“敕”等字样，认为这是日本对朝鲜的蔑视，因此拒绝将国书转呈朝鲜中央政府。日本政府便将此事视为朝鲜的“无礼”，并当作“征韩”的借口。木户孝允、岩仓俱视以及军事实权人物大村益次郎等人，立即开始对出兵朝鲜进行认真地计划。木户在给大村的长信中曾阐述了他的设想：“主要以武力开辟韩地釜山。……万一交戈之时，切勿急进；规定年年所需费用；占领一地之后，熟虑日后攻占之策；持之以恒，努力不懈，不出两三载，天地必能大改其观，一旦付诸实施，则万世不拔之基将愈趋巩固”^②。外务省大丞柳原前光专门写了本《朝鲜论稿》，在说明侵占朝鲜的重要性时写道：“朝鲜北连满洲，西接中国，使之屈服，实为当前保全皇国之基础，将来经略各国之根本，倘被他人占先，国事休矣。”^③不久，被日本政府派往朝鲜进行调查的佐田白茅回国，上书明治天皇，认为征服朝鲜是“富国强兵之策”，而且“不惟一举而屠朝鲜，大练我兵制，亦可大耀皇

① 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中译本，第3页。

② 《木户孝允文书》第三，前引书第4页。

③ 《日本外交文书》，日文版，第3卷，第149页。

威于海外，岂可不神速伐之也”，“如清出援兵，则可并清伐之”。^①

侵占朝鲜虽然已成为日本政府的既定方针，但是在何时付诸行动这个问题上，在政府上层人物中却产生了分歧，形成了两派，即所谓“即征派”和“缓征派”。

即征派以明治政府参议兼近卫都督、陆军大将西乡隆盛为首，以九州地方的改革派武士为主要成员。1868年，反对幕府的内战刚刚结束，改革派武士佐田白茅即向政府太政官建议“征韩”。之后，佐田又多次上书天皇，申述其主张，并得到外务官员森山茂、大村益次郎等人的响应。1873年2月，西乡隆盛开始在政府首脑人物中极力鼓动“征韩”。同时，西乡还和参议板垣退助、外务卿（后兼参议）副岛种臣等人商讨攻占中国台湾。他们计划先以外交手段，使欧美列强不能干涉，然后突然出兵，占领该地。西乡等人的主张曾一度得到明治天皇的支持。

但是，此时日本国内局势尚未稳定，仍然不断有封建士族叛乱发生，加上明治政府财力不足，因此，以维新元老岩仓俱视、大久保利通为首的一些人对即征派的主张表示坚决反对，形成所谓“缓征派”。当时，两人作为特命全权大使刚刚从欧美考察归来。他们看到即征派中有不少反对明治政府的中下层武士，如果立即出兵朝鲜，将使这些人的力量迅速膨胀，形成强大的势力，因而他们主张先在国内进行改革，增强国力，然后再侵略朝鲜乃至中国。1873年8月，处于两派中间的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因病辞职，岩仓俱视成为代理太政大臣，缓征派占得上风，很快便将西乡隆盛撤职，驱出内阁（1877年在九州发动叛乱，兵败自杀）。

然而，掌握了实权的岩仓、大久保等人却在1874年实施了西乡制定的侵略台湾的计划，发动了日本近代史第一次侵略中国的战争。紧接着，又在次年9月将侵略朝鲜的计划付诸行动，派遣春日、云

^① 黑龙会：《东亚先觉志士记传》，日文版，上册，第22—23页。

扬号军舰侵犯朝鲜，制造了江华岛事件，并迫使朝鲜政府与其签订《朝日修好条规》，开始将朝鲜置于不平等的、附属国的地位。日本在朝鲜半岛这块被其视为侵略中国的天然跳板上，取得了种种特殊权益，1868年以来酝酿的征韩阴谋，至此得到了初步实现。当然，侵略朝鲜只是日本政府推行对外扩张政策的开端，中国才是其最主要的进攻目标。因此，在侵略朝鲜的同时，明治政府就把矛头对准了中国。这是它的既定方针，也是其走向帝国主义的必然结果。

虽然要进行的是侵略战争，侵略者也总是要为自己的行动寻找一些冠冕堂皇的理论根据。与“失之欧美，取之亚洲”的强盗逻辑相适应，在日本便出现了“脱亚论”、“兴亚论”等宣扬侵略有理的荒谬论调。

1885年中法战争中，中国清政府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却同法国政府签订了屈辱条约。这一腐败情形，更加刺激了日本政府的侵华野心。这时，一些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便大肆鼓吹对外扩张，侵略中国。而一些自由民权运动的倡导者也把“国权”置于民权之上而成为“国权主义”者，实质上就是扩张主义者。其代表人物为福泽谕吉。他在《时事新报》上发表《脱亚论》一文，赤裸裸地宣扬其侵华主张。他在该文中声称：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国民精神”已从亚洲落后状态中脱颖而出，“移至西欧文明”，而亚洲的主要国家中国仍处于落后地位，并濒临被瓜分的危险。在这种形势下，日本“不可犹疑，与其坐等邻国之振兴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之办法，不必因为其为邻国而稍有顾虑，只能按西洋人对待此类国家之办法对待之。”^①也就是说，日本应当脱离亚洲国家的行列，而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欧美国家，反过来用欧美国家使用的办法也就是武装侵略来对待亚洲国家主要是中国，充当“东亚洋人”。由此可见，“脱亚

^① 《福泽谕吉全集》，日文版，第10卷，第239页。

论”实质上也就是“征服亚洲论”。在这一论调影响下，具有国权主义思想的学者、文人、朝野政客以及浪人等，纷纷通过报刊杂志鼓吹侵略中国。1885年，柴四郎出版了宣扬对外扩张的小说《佳人奇遇》。在这部小说中按“脱亚论”的调子，要求日本加入抢劫中国的行列，高呼方今日本的燃眉之急“与其内张十尺之自由，不如外伸一尺之国权”^①。由于适应了当时日本舆论界的扩张思潮，所以这部小说立即成为畅销书。此外，还有西村茂树等成立“日本讲道会”（后改名为“弘道会”），三宅雪岭组织“政教社”，发行《日本人》杂志，陆羯南创办《日本》报纸，樽井藤吉甚至发表吞并朝鲜的《大东合邦论》，等等，竞相为日本加快侵略步伐而呐喊助威。

在对外宣传上，日本政府为掩饰其对亚洲国家的侵略政策，蒙蔽这些国家，甚至取得它们的同情与合作，又以共同反对西方列强尤其是俄国的入侵为幌子，提出了所谓“兴亚论”。1880年，一部分政界人士在日本政府示意下组织了“兴亚会”，鼓吹兴亚主义。其中，以荒尾精炮制的一套侵略“理论”最具代表性。他在其“兴亚策”中说道：19世纪后半叶，欧洲各国势力汹涌东来，亚洲国家已大半沦亡，只剩下日本、朝鲜和中国，而其中只有日本完成了维新大业，正在向前发展，中国和朝鲜则极为贫弱老朽，在欧洲列强的攻势面前软弱无力，岌岌可危。在如此紧迫的形势下，日本对于“朝鲜的贫弱，即令不为朝鲜忧之，亦应深为我国忧之”；对于“清国的老朽，即令不为清国悲之，亦应深为我国悲之”；如果日本要“内张纲纪，外加威信，使宇内万邦永瞻皇祖皇宗之懿德，必先救此贫弱，扶此老朽，三国鼎峙，辅车相依，进而挽回东亚之衰运，恢宏声势，膺惩西欧之虎狼，杜绝其覬覦。事莫急于此。此诚为国家百年大计，又为目前一日不可忽视之急务。”俨然把日本说成是亚洲的救世主，一副悲天悯人、救苦救难的菩萨心肠。荒尾精还鼓吹，日本是顺从

^①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史》，中译本，上册，第216页。

“天意”才走上富强之路的，所以应该由日本来领导东亚。他设计了这样的“领导方案”：用中国的人力物力，在陆地上训练 120 万以上精兵，在海洋上建立 100 支以上的舰队，由日本驱使，发扬“尚武精神”，去征服整个世界。其结果必将是“东洋文明光辉宇内，亚洲威风扬于四海”，“此实为我帝国之天职，顺天之责任”。^①此外，荒尾精还抛出了所谓“宇内统一论”，即宣扬日本的皇国体系无比优越，日本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自然天成”的国家，所以理所应当由日本来“统一宇内”，支配世界。这些在今天看来荒谬绝伦不值一驳的东西，当时却蛊惑了一大批日本人，很短时间内大约有 150 余名在政治上失去前途的浪人武士，抱着对抗欧美入侵，以日本为中心振兴亚洲，“挽救”与改造中国的目的，相继进入中国，他们当中虽然有极少数——如宫崎寅藏——确实是怀着拯救中国的良好愿望，献身于中国的反帝反封建事业，但是绝大部分却成为日本进行侵华战争的急先锋和骨干分子，其中不乏谍报与谋略人员。

1889 年底，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代表人物，被称为“日本近代陆军之父”的山县有朋上台组阁。次年 3 月，他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向明治天皇进呈《外交政略论》，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主权线”和“利益线”的侵略理论。他说：“国家独立自主之途有二，一曰防守主权线，不容他人侵犯；二曰保护利益线，不失形胜地位。所谓主权线，系指国家疆域；所谓利益线，系指与主权线安危密切相关之区域。……方今介立于列国之间，仅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护利益线，经常立于形胜之地。”他还强调，如果别国“侵入”利益线，则必须以“强力排除之”。同时他还具体指出，当时日本“利益线的焦点”是在朝鲜。^②之后，山县有朋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时，进一步强调其“保护利益线”的主张。根据他

① 黑龙会，《东亚先觉志士记传》，日文版，上册，第 361—368 页。

② 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原书房 1966 年版，第 203、197 页。

的这套强盗逻辑，日本可以借“保护利益线”之名，一步一步占领朝鲜、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最后独霸世界。

山县有朋这一侵略理论的出现，标志着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的最终形成。几年后，日本便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此后半个多世纪里日本发动的一系列侵略战争，也都是在这一政策指导下进行的。

二、谍报指挥机关的建立

日本在发动侵略战争尤其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时，十分注重间谍情报活动，不断派出谍报与谋略人员，以各种方式进入中国，从事刺探情报、煽风点火、制造混乱等种种阴谋勾当，为其侵华服务。操纵这些间谍人员的谍报指挥机关，主要是由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等部门组成的军事谍报与谋略指挥机关，以及由一些与日本政府及军方有密切联系的右翼团体或组织形成的所谓民间谍报与谋略指挥机关，其中以前者为主，后者为辅。此外，日本外务部门也经常参与其事。

日本从明治维新到发动甲午战争之前，其军事指挥机构几经变革，谍报与谋略职能不断加强。1868年1月，明治政府废除旧幕府军职，设立新的总裁、议定、参与三职，领导军队。1869年8月，设立了兵部省，内设陆军系和海军系，后改设为陆军部和海军部。在陆军部中除秘史、军务、炮兵等局外，还另设了一个参谋局。1878年，日本学习德国的军事制度，在陆军方面进行了一项重大改革，即将参谋局从陆军省里分离出来，成立参谋本部。根据《参谋本部条例》，参谋本部与陆军省地位相同，成为直接隶属于天皇的军令机关。凡属军令事项，由参谋本部长运筹策划，经天皇裁可，交陆军省执行，不必经过太政大臣，即形成所谓军事统帅权的独立。参谋本部的成立，标志着日本开始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同时对日本加强对外

间谍与谋略活动也具有重要作用。设立该机构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为我国（日本）对邻近大陆的俄国、清国、朝鲜进行扩张作好准备”；它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对“支那、朝鲜、桦太、满洲、堪察加、西伯利亚沿岸”的“地理”、“政志”进行详细考察，“为有事之日，作好其参划之图略”。^①

1888年5月，参谋本部曾一度废止，而由参军取代，参军之下设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参谋本部。1889年3月，实行陆海军分开指挥制度，参谋机构改称参谋本部和海军参谋部。1893年5月，海军参谋部也从海军大臣管辖下独立出来，升格为海军军令部。这样，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便成为日本两大军事间谍与谋略指挥机关。其总长最初均由皇族亲王担任，后来才改为在军官中提任。

1893年5月19日，日本政府以明治天皇第52号敕令，颁布了《战时大本营条例》，规定战时设置由天皇直接统辖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负责协调陆海两军参谋和军令机关，制订作战计划，指挥全军作战。6月5日，大本营设立于陆军参谋本部内。陆军参谋总长成为大本营的首脑人物，负责辅佐天皇指导全面战争。此后，大本营便成为日本战时对外派遣间谍以及进行谋略活动的指挥中心。

在日本军事谍报与谋略指挥机关早期对华侵略活动中，有两个人物起到了重要作用，为日本军事情报工作打下了基础，他们就是陆军大将川上操六和海军大将桦山资纪。

川上操六（1849—1899），鹿儿岛人，入伍后迅速晋升，1878年任仙台镇台大佐参谋长、近卫步兵第一联队长。1884年随陆军卿大山岩赴欧洲考察，次年升少将，任陆军参谋本部次长。期间曾调任近卫步兵第二旅团长，并赴德国学习。1889年3月再度担任参谋本部次长，在职期间多次派遣间谍潜入中国，对荒尾精等人在中国建立情报机构给予大力支持，甚至以个人私宅做抵押为其筹措经费。

^① 大久保利谦：《近代史资料》，吉川弘文馆1974年版，第213—215页。

1893年4月至7月，川上操六亲自率领大批参谋人员到朝鲜和中国各地进行实地考察。他们从朝鲜半岛北上，经辽宁入山海关，转赴各地。一路上在釜山、仁川、汉城、天津、北京、南京等地，详细考察了兵力、军事部署、武器装备、气候、地形等，进一步核实了间谍们所搜集的情报。特别是川上一行到达天津后，清政府北洋大臣李鸿章亲自接待，竟然允许他们参观天津机器局的枪、炮、火药的制造，访问天津武备学堂，观看步兵、炮兵的操练，使其亲眼目睹了中国军队的实力，得出了“中国不足畏”的结论，“更加增强了信心”^①。一场大规模的侵略中国的战争计划，这时已在川上操六的头脑中酝酿成熟。甲午战争后，川上又积极筹划对俄战争，并多次派人到俄国考察军事。1898年1月，川上升任参谋总长。

桦山资纪(1837—1922)，鹿儿岛人，曾参加明治维新运动。1871年任陆军少佐。1873年受西乡隆盛派遣到中国进行情报活动。1874年参加对中国台湾的侵略战争。1884年转入海军，次年升中将。1890年任海军大臣。甲午战争爆发后，出任海军军令部长，参加指挥黄海海战，因功升海军大将，授伯爵。桦山资纪任海军军令部长期间，为日本海军的对外情报活动奠定了基础。其后，他曾历任台湾总督、内务大臣、枢密顾问官、文部大臣、警视总监、国务大臣等职。

除了上述军方的指挥机构外，一些右翼团体或组织也在日本对外进行间谍和谋略活动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英国著名的谍报史专家理查德·迪肯所说：“日本情报机构实际上只不过用了五六十年时间，就从17世纪的水平发展到20世纪的水平。(中略)日本人利用许多爱国秘密社团配合本国官方保安机关和情报机构的例行工作，从而使它的情报工作在短短的时间内迎头赶上。”^②在这些

^①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上卷，第25页。

^② 理查德·迪肯，《日本情报机构秘史》，中译本，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

组织中，玄洋社是最有影响的一个，甚至有人称它是“日本第一个在国外进行秘密间谍活动的组织”^①。

玄洋社于1881年在九州福岡成立。其创始人头山满、平冈浩太郎和箱田六辅等人，社长由平冈浩太郎担任。因其以“玄海（九州北部的玄海滩）怒涛，势可捣天”自夸，故取了该名。它声称自己的宗旨是“尊皇卫民”、“爱重本国”，标榜所谓天皇主义、国权主义、民权主义三原则，但是随着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玄洋社也开始极力鼓吹对外侵略扩张，并与军部、财阀、官僚相互配合，参与日本历次对外战争，在派遣间谍、进行谋略活动方面，成为军方的得力帮凶，被称为“恐怖组织和间谍学校”^②。

玄洋社的一系列阴谋活动，都是与头山满、平冈浩太郎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头山满（1855—1944），九州福岡县人，明治初年参加不平士族的反政府运动以及西乡隆盛的叛乱活动，曾被捕入狱。1878年与箱田六辅、平冈浩太郎等人组织向阳社。1881年，以“办教育培养民权”为号召，联合其他一些小的政治结社，组成玄洋社。此后，对内鼓吹“尊皇主义”和“国家主义”，对外标榜“大亚细亚主义”，极力策动侵略中国和朝鲜，在日本朝野上下影响巨大。同时，头山满还多次在幕后策划恐怖活动，如1889年向外务大臣大隈重信投掷炸弹事件和1913年暗杀外务省政务局长阿部守太郎事件等。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对头山满曾有如下一段描述：

在他的指挥下，他的党羽深入到中国的各阶层，从清末的王公大臣如允升之流的身边，到贩夫走卒如张园的随侍中间，无一处没有他们在进行着深谋远虑的工作。日本许多著名的人物，如土肥原、广田、平沼、香月等人都是头山满的门生。据

① 理查德·迪肯：《日本情报机构秘史》，中译本，第28页。

② 同上，第29页。